

三、美国的人类学

人类学是从生物的观点和文化的观点来研究人类。涉及到把人类当作一个动物那部分人类学称为体质人类学。涉及到生活在社会里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生活方式那部分称为文化人类学。没有一个人人类学家能够全面地研究这个定义所划分的范围。然而整个人类却是所有人类学研究的中心。

人类学的范围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是论述生活在社会里的人类，或是论述这种社会的文化产物。因而在人类学和这些别的学科之间必须有一个分工。这种划分是建立在观念与理论的相互交流和借鉴上的。人类学者在人类创造的整个领域上感到行动自由，同时别的学科则从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中自由借用。

人类学领域的广度本来就是人类学的历史发展的产物。人类学者首先研究的是西欧以外的那部分世界的文化。当一个人在一个与自己的文化不同的社会里工作时，他必须是一个万能博士，或者至少争取作一个万能博士。他通常一个人独自在荒山旷野上工作。当他在从事艺术、音乐、文学、以及经济等各种不同的文化材料的研究时，完全缺乏这方面的专家的协助。

例如，对一个研究爱斯基摩人的人类学者，就要求他能对

注：标题编者加的，因选自美国百科全书(1980版)其观点是代表美国学者的，故名之，其中内容也有涉及其他国家的。

体质人类学有足够的理解，才能够对活着的人们进行测量，或者至少能够描述他们的体质特征。他也必须能够辨认出考古学的遗存，以便追溯出它们与现行文化之间的关系。他学会讲这种语言并能抄录当地的文本，在这儿他就是在专门研究语言学。然后他转移到政治科学中去描述村子是怎样被管理的。当他观察狩猎和采集食物怎样进行，食品怎样分配，皮毛怎样交易或在交易站出售，这时他又涉及到经济学了。然后他可能绘制出村子的地图，记录村子内人们相互间的社会联系，这里他就是在实践社会人类学或较复杂社会的社会学了。为了收集歌曲、圣歌、和神话，他需要一些文学、民俗学、和音乐方面的知识。当他观察仲冬宗教仪式和巫术活动时，他已转向研究宗教了。如果他收集生活的史料，制订个人的家谱联系图表，和记录他们的病理与医疗实践，这个人类学者就是在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以及医学的领域里工作了。

人类学的划分。现代的人类学者已不大是一个万能博士而更是一个地道的专家了。然而这个领域的范围仍然是广阔的，按照美国对这门学科的解释尤其如此。在美国的研究所学习的人类学研究生就要求他掌握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知识。

广义地说，文化人类学包括语言学和考古学。但由于人类学研究的规模与复杂性日益扩大，美国的现代人类学家便有专门研究一个分科的趋势。然而在各分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于人类学作为人类的综合科学的意义来讲仍是不可缺少的。

在欧洲，对人类学的解释就不尽相同，“人类学”这个名词通常是指体质人类学。其他那些在美国是构成这个包罗万象的领域的许多研究，在这里都彼此被分开，并且从体质

人类学范畴内划分出来。因之在欧洲一个人就得专攻人类学（那是生物学的分科），专攻考古学，专攻语言学，或者专攻民族志（研究个别的文化）。本文则从广义来论述人类学，包括对人类的体质和文化研究。

扩大人类学的中心。人类学的范畴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而扩大了。从十五世纪直到十八世纪，现代人类学的先驱是一些撰写论文试图解释种族的起源与分布语言、和由于世界性的探险而被带入到欧洲的意识里的文化。到十八世纪，某些哲学家把一些很像美洲印第安人那样的群体看成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中未曾被文明所腐蚀一样；而另外的学派则把土著民族看作是从文明状态堕落为野蛮民族的遗裔。

在十九世纪，人们的思想仍然集中于土著民族与土著文化对欧洲文化中的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根源的历史关系。然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却产生了一种动力，它推动人们把土著民族和土著文化看作是人类的种族和文化发展的化石遗物。在二十世纪，人类学家除了试图解释其它文化的起源与演变外，开始集中研究他们同时代的土著文化所起的日复一日的的作用。在重点上，曾有过一种继续不断的转变，从对文化的历史复原——现在大部分留给了考古学者和某些综合理论家去研究——转移到对不同程度的当代情景的了解上。

比较早期的人类学者观察土著民族的方法和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与现今的人类学者不一样。第一组问道：你们从哪里来？你们与基督宇宙起源论有何联系？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模棱两可的。有些人类学者认为土著是生活在圣经上人类的堕落以外的高尚的未开化的人，而另外的人类学者则断定土著民族是较高文明的叛徒。学者们对这种问题争论不休：人类所有的种族的起源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在十九世纪，研究的意图是确定文化发展的演变阶段，并依据这些阶段把现存的文化予以分类。在二十世纪，人类学者一直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特定的文化如何产生作用，如何满足人类的基本要求。许多人类学者的询问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当人们的制度不能再满足人们心里上的需要或其它方面的需要时，人们是怎样改变他们的文化的。

与其它学科的联系。在主题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人类学不仅和心理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有联系，而且还和自然科学有联系。例如，人类学所采用的研究技术是借自生物学和地质学的。在研究其它的文化时，同样地与人文科学有联系。人类学者从人文科学中研究土著民族的哲学和宇宙起源论，以及他们的音乐、舞蹈、塑造艺术和绘画艺术。这些艺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其本身活动范围内的汇合，把人类学置于一种独特的地位，对各方面的人类行为提供一种综合性的探讨。

因而人类学成为学术界三大文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归根结底，人类学者非常关心于探索人类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日复一日的生存，同样地又关心人类，以最远大的眼光把人类看作是一种文化建设、确定价值的动物。

人类学者对希望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地区和时代的内界以外的个体感兴趣，向历史学者传统地就是关心过去的时代。他的兴趣几乎完全集中在文化的发展上。也就是集中在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身上。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政治科学也已倾向于把研究中心集中在西欧的文化上。部分原因是受了人类学的刺激。在这些领域中的许多学科扩大了研究范围，成为文化交叉的和相互比较的

学科。

其他社会科学由于看到了人类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充实了自己这门学科。相反地，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的内容也丰富起来，那是因为他们借用了人类学者所使用的园地，在这块园地上人类学家能够发现用来研究非欧洲文化的新问题和新技术。这些欧洲传统以外的文化对那些主要从事于研究自己文化的其他社会科学家提供了检验理论最有效近似值的活实验室。

工作在荒山旷野上、生活于较小的文化群体中的人类学者，完全靠直接观察来进行研究。他必须观察他所研究的这个社会里各种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野外研究使他觉察到在西方学术界各学科之间的虚假界线——这些界线多半是由于历史上一些偶然事件造成的。他洞悉生活中那些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和艺术的范围都不是独立的整体，而实际上都是为人类生存而统一设计的图案里相互依存的各个部分。

文化人类学

在学者们用以划分文化人类学领域的方法上是有相当大的变化的。从历史上看，文化人类学的主要分类是考古学和民族学。民族学又再分为民族志、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民族志是研究单一部落或群体内的生活方式的；而民族学则是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或者各种文化的一些部分。考古学可以看作是已经湮没了的文化的民族志和民族学。

在美国有一种用再分类的方法来组织文化人类学的趋势，论述着原始社会的各种制度。例如，有些专家把时间用

于对宗教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或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的研究；而另外一些专家则专心致志于文化变迁和文化移入等过程的研究。有些专家从事诸如音乐、舞蹈、艺术、以及口头文学等文化系统的产物的研究；而别的专家则为民族学与历史的领域、或者民族志与心理学的领域架设桥梁。

民族志

民族志——研究单一群体的文化——是人类学的中心。野外工作是培训一个文化人类学者的基础，野外工作的文字报导则构成文化人类学的核心。世界各地的土著文化可以看作是一个活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文化人类学者发现在他到达一个地点时，他的实验总是在进行中。他必须在他的报告中构造一个当地文化的模式，以便了解这个文化的各个部分。而且还必须把这个模式译成其他人类学理论家的共同语言。因此在人类学方面对任何部落的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集中于一个实验的前提下——同时需要观察和假设。这种演译的方法与经验主义的方法之间的交替使用给予研究人类的文化人类学以一种特殊的性质。

野外观察者撇开了他自己的文化，必须尽可能沉浸于他所观察的文化之中（但要防止从心理上完全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的危险）。他必须作到看待这种文化犹如当地人看待它一样的程度。除此以外，他必须画出一幅连当地人也不必去认识的文化活动图，正如一个人可以讲一种语言而不知其基本语法一样。人类学者在正常情况下必须是一个裁判员，能够判断在这种文化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同时也是一个批评家，能够对自己所作的最后分析加以评论。在某些场合中，另外的民族志研究者重新研究这个文化时，他的研究会把这个人类学者的文化报告为他自己的性格和理解力所渲染的程

度给揭示出来。

自从威廉·L·沃纳(William L. Warner)的《扬基城研究》(Yankee City studies,此书于1941年开始出版)出版以来,研究小型社会的野外技术已为人类学者用来调查部分的美国社会。沃纳从他的澳大利亚野外工作带回来的探索方法——强调面对面的现场观察法——和社会学者传统地用来研究西方诸社会的大规模调查和散发调查表的方法迥然不同。

直至最近,民族志研究者的许多工作都集中在描述上,尽力把有关一些部落和群体的资料在他们的文化湮没于这变化的世界中之前给记录下来。这种性质的一些紧急抢救民族学的特点工作现在仍在进行中。但是民族志研究者更有可能到荒山旷野去重新研究以前有人研究过的社会,或者去检验出有关文化和文化变迁的一种有限性的假设。现代从事野外工作的人类学者比起多年前的老前辈来,更加注意到他的理论基础。

民族学

民族学是对人类各种文化持历史观点和结构观点二者相对抗的竞技场。对各种制度的比较的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那种对起源与发展阶段独特的探索。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婚姻、亲族关系、和各种宗教制度。这个运动体现了依靠对现行资料的分析来解释过去的意图,换言之,在间接证据的基础上去了解文化演变的过程。恰似达尔文和华来士(Wallace)主要是以现存的现象为基础才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

来自考古学的资料大大地代替了那些关于过去的文化起源的假设。历史上的特殊论者们——后来发展到反对进化论者的探讨——正在试图复原一些个别文化而非全部文化的历

史，他们也正在寻求文化的形成与文化变迁的原理。

现代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虽然仍对文化变迁的描述和文化变迁的内在规律感到兴趣，但是他们目前也更加深入细致地工作了。现代的功能的分析倾向对把各种社会看成是这样：社会内部有一种隐藏的结构，这种结构一定会被文化人类学者发现或者明确描绘出来，在这个文化内的民族被假定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潜在的结构，犹如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没有意识到英语中无意中形成的音素体系一样。

根据惯例和历史的发展，人类学者倾向于把人类生活看作是遵循着便利于和其他文化相比较的方式进行的各种相互影响的象征性体系。分类通常包括亲属关系和社会、经济、巫术与宗教、军事、法律、和政治等制度。然而必须强调，这种再分类法是独断的。而按功能来分类则是民族志研究者和民族学者的工作。而且在一种特殊的文化中，并不需要很明显的分类。新几内亚一个部落的土人给邻近的亲属发出邀请，同时又为交战准备巫术与宗教的仪式，这种交战可能会由剩余的猪只或成熟的水果挑起来。他们并不把世界划分成为民族志里的通常的种类。再者，这种交战的外表的、明显的作用可能与那些隐藏的、潜在的作用不同，这种交战在影响所及范围内对这个部落的生态平衡起作用。

亲族关系

使欧洲文化人类学者深感需要用新的工具来描述的首批问题之一，就是论述家庭和民族组织的问题。这种家庭和氏族组织与欧洲的家庭和氏族组织很少相似之处。这些异乎寻常的亲族制度最初被认为是比较早期的婚姻家庭关系。但是现在民族学者则把他们当作现存的社会关系的象征性图表。亲族制度对人们之间所期待的态度和行为提供指导的准则，

这些人用一种特别的名词来互相称呼或者提到别人。在《社会结构》(1949年出版)一书中, G. P. 穆尔多克(G. P. Murdock)不仅把亲族关系分了类, 并且指出它们有向预定的方向变化的趋势。他注意到作为对新的居住惯例的反应, 新的血统和有血缘关系的群体有形成的倾向。最近的研究已集中在非直系亲族的群体和对亲族关系措辞的分析上。

宗教

把宗教作为原始文化中的一种制度来研究, 在二十世纪已起了实质上的变化。许多十九世纪的人类学者把宗教的演变看作是一种直线性的进展。通常由万物有灵论(animism, 相信精灵)到一神论。文化方面的理论家则持不同的观点, 假定原来的一神论最初被启示给了人类, 接着又衰败下去, 并从原来的宗教里消失。由詹姆士·弗累则爵士(Sir James Frazer)提出的另一种演进论的方案, 展望了一种由魔术到宗教到科学的发展。R. R. 马璃特(R. R. Marret)以他的对于波利尼西亚的mana——一种无生命的、非人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在波利尼西亚的宗教体系中最基本的要素——的概念的讨论, 扩展了宗教情感的概念论。

厄米尔·杜凯姆(Emil Durkheim)把宗教制度内的概念加以系统化, 把他的分析莫基于澳大利亚的Arwnta。麦克斯·韦伯(Max Weber)探索了西欧宗教制度与宗教制度之间的关系, 而且也扩大了他对印度和中国的宗教的比較的分析。像克劳德·李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说的那样, 现代宗教关心的是分析宗教体系的基本结构基础。他试图把语言结构的模式应用到对宗教和神话体系的研究上。

对宗教体系中所表示的对生态学体系和生态调整的研究

是以马温·哈里斯 (Marvin Harris) 的1965年对印度圣牛的研究为代表。对这种圣牛的论述常常被人引用认为是一种浪费的体系。而哈里斯却证明这种论述是极大限度地开拓边缘荒地和这种圣牛的研究的一种有作用的体系。另一种现代兴趣是对文化变迁中的宗教组成部分的研究。把对新的宗教的研究当作复兴运动的, 可用A.F. 华来士 (A.F. Wallace) 对易洛魁人中的《漂亮的湖》宗教 (the Handsome Lake religion) 的分析作为例子。按照这种观点, 宗教成为一种价值制度、世界观、和行为世界的道德秩序的总和, 在这种行为世界中个人的性格必然起作用。

经济人类学

随着卡尔·波兰伊 (Karl Polanyi) 承认对货币、市场、和劳动与生产合理化的古典经济分析中那种民族中心主义基础, 经济人类学的突破出现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于认识到经济分析中的这种受文化约束的性质, 显而易见, 市场心理并不适用于人类学者所研究的大多数社会的经济。他们的经济生活是埋藏在他们的全部文化中的。波兰伊和乔治·达尔顿 (George Dalton) 及其他学者, 根据礼物赠送, 相互交换, 以及在真正比较的基础上对货币和市场体系制度作出的一种功能性的分析, 发展了对非西方经济体系的解释。通过文化渗透, 西方型式的市场和货币以及西方关于劳动的经济理论基础正被介绍到世界更广的地区。当这样的事发生时, 西方的概念可能更恰当地用来分析这些经济体系。

性格与文化

性格与文化研究的迅速发展是临床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说、和人类学的野外工作之间的交叉刺激造成的。对从学术的和医学的心理学提出来的假设的测验, 导致了文化人类学者

了解个人及其文化的关系的新的概念。在这个领域里的某项首创工作就是布朗里斯诺·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根据他在特罗布里恩群岛野外考查对弗洛伊德学说进行的测验。从心理上观察个别印第安人的两个重要的早期作品有：保罗·拉丁 (Paul Radin) 的《响雷》 (Crashing Thwnder, 1926年出版)，这是温尼贝戈的一个印第安人的传记；还有瓦尔特·戴克 (Walter Dyke) 的《哈特老头的儿子》 (Son of Old Man Hat, 1938年出版) 这是一个纳瓦霍人的自传。

约翰·W·怀庭 (John W. Whiting) 和欧文·L·奇尔德 (Irvin L. Child) 的《儿童训练与个性》 (1953年出版) 说明了一门学科如何促进了另一门学科。怀庭和奇尔德依据先学习理论然后把理论应用到多种文化上来检验这个理论的方法，来应用地解释弗洛伊德的固定理论。有关这些文化的资料可在以《人类关系地区档案》 (HRAF) 著称的这种交叉文化记录中找到。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儿童训练与个性之间的一些概念，又重新形成。以后又有六个调查队被派到野外去进一步研究社交往来与个性形成的相互关系。

采用罗斯查 (Rorschach) 测验和其他来源于临床心理学的投射技术使民族志研究者已能用数量来表达他关于性格特征的性质的主观意见，这种性格特征是一个部落的成员所共有的。而且还有可能通过时间的延续来对性格方面的变化进行各种定量研究。这种研究可以通过重新研究一个群体或者在不同程度上被西方文明所同化了的一些群体的办法来完成。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A·I·哈洛维尔 (A. I. Hallowell) 和他的学生们用文字记录了在

加拿大奥杰布瓦人和美国的奇佩瓦人中由于不同程度的文化渗透而引起的不同程度的性格变化，以及健康的性格起到作用的伴随程度。最近乔治和路易斯·斯平特勒(Louis Spindler)在梅诺米尼的男人和女人的研究中，发现了男性和女性中最有代表的性格类型之间有意义的差异。在两个性别的心理学上的“重心”似乎朝着相反的方向拉引——男性拉向西方化，而女性拉向保守的位置。用统计的方法与男人相比较时，女人就显得更健康些。这个结论与哈洛维尔在奥杰布瓦人中的发现是相似的。

对艺术、音乐、午蹈、和口头文学的研究

在人类任何一种象征性文化产物中受到最长久最精心研究的就是塑造艺术和绘画艺术。当西方艺术家们开始用土著民族的产品作为现代艺术的基础时，在十九世纪被收集来的手工艺品——如陶器和编制物的样品——才开始被重新命名为艺术。美国人类学者弗兰兹·波亚斯(F. Boas)对艺术、手工艺品为审美对象和手工艺品作为有用的物体之间，没有作出明显的区别。波亚斯从艺术在社会上的来龙去脉来审查艺术，驱除了十九世纪的那种理论，这种理论是把原始艺术品按某种进化的规模来排列的。

对音乐午蹈的人类学的研究落后于对塑造艺术和绘画艺术的研究。早期的野外收集者缺乏把土著民族的音乐午蹈进行录音和编制程序的设备。为西方音乐午蹈设计的注解不足以代表内容丰富多彩和千变万化的民族志资料。只有随着为交叉文化分析设计的注解体系的发展，甚至更革命的使用磁带、唱片、和电影才使得对这些文化产品的直接记录成为可能。

许多早期的民族学的藏品作为获得语言文本的一种手

段。当然也还有为收集而收集的。艺术、音乐、和民间传说以同样的兴趣吸引了民族志研究者。可能因为音乐和民间传说易于由一种文化传输给相毗邻的一种文化，所以它们构成了传播研究的基础。这种传播研究把重点放在民间传说的情节的传播上，和音乐中的歌词和旋律的传播上。在民间传说的领域里，早期的传播研究集中于来自高度文化的故事之传播诸如印度的故事或地中海的故事。依据地理上的传播到邻近的地区，以后的研究就更加细致入微更加独特了。也有一些理论，认为民间故事体现一种从宗教仪式到神话的演变。弗兰兹·波亚斯把民间传说看着犹如用一面镜子来对照工艺学和文化的其他方面。现代的结构分析企图仿效语言学的模式，把口头文学分析成许多组成部分，再分析他们是怎样组成的。理想的性格与口头文学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领域。研究文化英雄人物可以揭示出那种一个社会的成员认为是理想的性格特征。因此民间传说可以看着是建筑在文化领域之内的一个突出的体系。

收集圣歌、神话、民间传说以及所有的口头艺术的原文，导致了需要描述文化的文体与文体内个别变化之间的关系。人类学者也收集他们自己文化内的口述历史，企图发现个别人对他的文化印象采用的私人表达方法。在语言结构与语言内发展起来的口头艺术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另一个领域。一种民间科学，叙事文体，以及对世界的感性认识都会受到一种特定的语言左右现实的方式方法的影响。一种特定的语言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世界观和习惯想法之间的关系则是研究社交的学生们主要关切的事。

在艺术方面，现代人类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各个社会中的艺术的来龙去脉。人类学者问道：是谁搞艺术和在谁的主办

下搞的？批评家与审美标准是怎样涉及到艺术的；音乐、舞蹈、与艺术的实际结构是什么；这种结构不仅从事音乐、舞蹈与艺术的人能意识到，而无意中的摹制仿造者也能意识到，这种摹仿的东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就可以揭露出来？在研究中的特定艺术和生活上的其他活动有何联系？在那方面艺术符合工作与消遣的模式？艺术对于创作者和观众起到什么明显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语言学

在民族志和民族学方面的语言学的研究是由于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领域里的人类学者经常面临着要用奇怪的语言来记录原文和民间传说的任务。对理解这种奇怪语言的语音体系、结构、或语法，印欧语系的语言提供不了多少帮助，或者毫无帮助。分析这种语言并制订翻译原文的一种体系，往往成为用一种不懂的语言进行工作的人类学者的第一项野外工作任务。民族学者也发现对有关语言的分布的研究能够用来帮助确定各种文化间联系的程度，并为文化史提供证据。

人类学者使用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这种方法已经建立了如日尔纳语、拉丁语、印地语、和梵语等语言之间的联系，并把这些语言全部列入雅利安语系或印欧语系。这种比较方法同样适用于美洲印第安语言，如阿贡建安语(Algonkian)与易洛魁语(Iroquois)。人类学者因而能够按方言(dialect)、语言(Language)、语族(familg)分支(branch)、和语系(stocle)将世界的各种语言加以分类。称为词汇统计学(Lexicostutistics)和同源语言演变史学(glottochronology)的现代技术已成为一种手段，用来近似地确定历史上有联系的两种语言分离的时间。这两种技术

都是以挑选出来的词汇的语音变化的程度或比率为基础的。这种挑选出来的词汇被认为是变化率相对地一致，而且不易于被借用。

考古学

考古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民族学的目的是相同的：了解人类和他的制作品。考古学者利用过去的文化与文明的遗物来还原他们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者必须把全力贯注在他能获得的材料上，因此他着重物质文化与工艺学的研究。从出土文物中挑选出来的铁一般的事实取代了关于人们过去如何生活的许多较为古老的设想。

考古学又可分为以下几种：史前考古学（Prehistoric archaeology），论述那些尚无文字语言和缺乏书面描述的文化。研究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的墨西哥北部美洲印第安人的所有考古学都属于这个范畴。史前考古学（Protohistoric archaeology）论述如赛西安（scythians）这样的民族。这种民族在希腊的历史著作中在某种程度上曾被记载过。历史考古学（Historic archaeology）以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Williamsburg va）的出土文物为代表，用补充书面原始资料的方法，这些文物有助于复原这些历史上的遗址。

考古学者为了在荒山旷野上工作发展了一些专门技术。绘制地图和测量学（surveying）与民族志研究者的野外技术有些类似之处，但实际发掘古物的过程已趋于专门化。考古学者发现了地质学者是和他最亲近的。由于必须从出土文物中重新获得极大数量的资料，使得考古学者要求助于生物学者——动物学者帮助分析动物的遗骸；植物学者帮助作植物分析和花粉分析。这种性质的生物资料在复原这种文化

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方面帮助了发掘者。利用放射性物质来鉴定年代的新技术，更加密切了考古学者与物理学者之间的关系。

考古学者在处理和发表他的报导时，还必须像一个熟练的民族学者一样工作。他必须考虑在同一个地理区域不同时期的有关民族的民族志，也要考虑到同时代的民族的民族志，这些民族生活在比较相似的环境里，并具有相似的工艺水平：陶器、石制和骨制工具、金属制品、以及随着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而变更的房屋式样。研究人们所制造和使用过的物品有助于理解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并有可能追溯各民族和移民群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和通婚状况。

考古学者最后的任务是对这种文化按他能够揭露的程度勾画出一幅完善而准确的图画，并且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亲族关系按他复原的可能性勾画出一幅完善而准确的画像。出土文物往往对一种文化提供很不平衡的资料。对经济研究和工艺学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对政治和宗教提供的资料则稍嫌无力；而对社会的任何领域诸如：亲族关系、舞蹈、音乐、或口头文学等往往缺乏可靠的资料。对一种出土文物的最后报告之成功同样地衡量这个考古学家作为发掘者的技巧：衡量他如何正确利用科学器械和科学程序从一个遗址得到极大数量的资料；并衡量他能否应用最适当的历史的民族志的民族学的相似性来复原此文化画像的能力。

文化人类学的应用

文化人类学对当代世界的主要意义或许就是它对这样一种理解作出的贡献，即理解人类群体之间大部分紧张局势是文化因素而不是生物因素造成的。人类学者在要求团体之间的美好关系方面，在降低文化冲击的影响方面，在改善社会

团体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的重新安置的营帐里，人类学者就为这些目的而工作。他们参加过有指导的文化改造。如在秘鲁的维哥峡谷（Vico Valley）工程。他们把在较为简单的社会里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现代工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工厂和医院里的种种文化制度。

人类学者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负有责任的托管领土的行政机构提出建议。在以这种资格来雇用人类学者方面，美国是以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为范例的。所有这些国家都利用人类学者作为他们的文化官员的顾问。正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殖民地扩张的产物。让欧洲人把从前的殖民地世界看作是生活于文化中的人类，而不是一群供人剥削的对象，这已成为人类学家的职责。

体质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把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种类来研究。这种研究远在人是由较早的动物形态进化而来的这种假设之前，便已在欧洲开始了。在这个领域里的许多最早期的研究工作都是根据这样的设想：认为人种的变异是生来固有的、不变的，正如植物和动物的种类被认为是永不改变的一样。最初的体质人类学家试图用解剖学上的词语来描述人种的变异。

人体测量学

对人体各部分的测量——是在体质人类学中发展起来的描述技术之一。除了在特殊条件下，单纯的测量并无多大重要性。各种测量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指标和比率，这些都是对形态的描述。采用标准化方法进行的测量才有可能对个人与

个人间、群体与另一群体间进行比较。也可以把一个考察者所做出的描述和另一个考察者所作出的描述进行比较。对资料进行统计的扼要的处理使解释大量的测量成为可能；使对这种或然性——有些可观察到的差异是正确的而非取样不足造成的——进行检验成为可能；使分析体质特征变异的程度成为可能。

人类的进化

随着进化理论的出现，认为人的体型是有变化的世代相传的结果，这种假设大大地影响了体质人类学这个领域。人类进化的发展过程是依据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而绘出图表的，而最后以人类化石遗骸的直接证据记载成文。

现今人类的变异从其各方面来说，都是体质人类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从种族差异的演变情况看，种族差异被看作是由于地理上的隔离与文化的障碍而造成的近亲繁殖的结果，自然选择以适应不同环境的结果，遗传倾向的结果，以及对疾病的易感性与免疫的结果。现在遗传学的研究补充并扩大了生理学和病理学方面的比较研究。近来的研究已集中于人体构造或体型的描述上。现今的研究人员正调查研究人体构造和生理过程之间的关系。而生理过程似乎是造成疾病易感性的基础。对人体生长的研究不仅包括对身高、体重、腰围的人体测量，还包括对体型的摄影评价，以及对骨化的X光测定。现代的体质人类学者从对个人的生长研究中，得知个人的生长与人种的生长和进化有关。

灵长目化石和人类化石材料为体质人类学提供了人类进化的直接证据。这些化石和标志着年代部位的已知古物的动物遗骸之间的联系是从它们的地质年代得来的。相互关联的文化遗物也给人类学者提供了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的唯一直

接证据。那种将阐明人类起源的确切时间和地点的许多关键性化石证据尚未发现出来。我们必须期待从上新世发现更多的东西，在这个时期正是从类人猿转变到人猿的过渡时期。

在更新世较近的百万年时期包含有大部分有关人类进化的著名化石。大约在1,750,000年前或在更新世开始之前，用两隻脚直立行走的人猿的遗骸已在东非和南非发现。这些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显示了大量的体质变异，从大颌到小颌变化不等的种种类型，而且对潮湿地区的适应和对干燥地区的适应也有所不同。这些人猿似乎曾经生活在地面上，并曾使用过工具，虽然能人(Homohabilis)实际上很可能已经是这些工具的制造者。因此无论从考古学上看人类的起源还是从体质上看人类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更新世的最早时期，但是现在不再去追溯了。

在更新世的四个冰川进展的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一个在人脑大小方面的迅速发展，伴随着工具的数量与品种的增加。更新世中期的记载表明了人类进化为直立人(Homoerectus)。这种人在中国至少已学会制造能控制火的使用了。至到第四次冰川的进展时期，在生物学上来说，人类已经发展成为现代人种了。他已把他的文化设备增加到这样一种程度，使他能够在北极式的条件下在欧洲生存下来。这种条件和现今爱斯基摩人所面临的条件可以相提并论。

现代体质人类学者把现代的人看作是代表人类进化发展的现今阶段，他从事追溯人类祖先的记载，并把人类当作现代的生物现象来研究。再者，他认识到进化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因此他也调查研究现在仍在起作用的变形的机械作用，并且希望能预告未来的变化可能采取的方向。

灵长目学(Primatology)。比较解剖者很久以前就已认

识到人与猿猴很相似。这群动物因为有了人这样杰出的亲属而被称为动物的第一目或叫灵长目。灵长目研究的早期阶段是以实验室中带回来的或解剖的标本为基础。在十九世纪那些赞成或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人们都仔细认真地研究过这些形体。在二十世纪这种研究已被扩充到包括对生理学、生长、和血型、以及其他遗传因素的详细研究。这些研究继续说明了T·H·赫胥黎(T·H·Huxley)在十九世纪所论证的：人在他的天然亲属中与黑猩猩和大猩猩最接近，然后就是猩猩和长臂猿；人与新世界和旧世界各种猴则更为疏远，而与狐猴、东印度的狐猴(tarsiers)和树鼯鼯最疏远。

对灵长目的行为和社会的研究以旅游者的轶事和民间传说为伊始，而且在十九世纪继续在动物园里进行研究。到二十世纪对灵长目天性方面的详细研究开始于C·R·卡彭特(C·R·Carpenter)对长臂猿，和对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各种猴子的研究。近来乔治·沙尔勒(George Schaller)研究了深山里的大猩猩。而珍妮·古德尔(Jane Goodall)作过关于黑猩猩的报告。这些研究连同心理学者对灵长目的行为所作的实验研究一起，对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方法。

种族

在达尔文陈述了他的进化假设之前，人类变异的地理分布图表早已有人研究了。在民族学上进化论之前的最早争论之一是集中于人种的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今天种族的变异已被认为是进化过程中的结果。就是说，自然选择连同隔离程度、人口多少、以及居民遗传学的机械结构如遗传倾向都对可遗传的变异产生影响，从而在人类居民中产生了可以观察到的差异。在这些人种内的亚型(subtypes)是由可以遗

传的特征的不同复合体组成。他们是在冰川世纪我们的人类祖先相对地隔离造成的结果，也是每个居民适应人们所生活的很不相同的环境的淘汰压力的结果。在冰川推进时期，人类还没有现代人类所具有的工具和其他设备帮助自己防御大自然的力量。

体质人类学者因而把人类居民要适应的全部气候因素——冷热的变化、湿度的大小、海拔、各种虫害、以及和特定环境有关的疾病——看作犹如筛子一样，它们通过自然选择对人类的差异作出了贡献。血液里有一种成分叫做血浆球蛋白S，在某些人中，它产生镰状红细细胞贫血病，而在另一些人中，它却提供对疟疾病的免疫力。人类学者在有传播疟疾的疟蚊存在的地区，已发现相当多的人都有这种免疫力。一种文化因素。刀耕火种的园艺学的传播，大大地扩大了疟蚊能够繁殖的环境。

因此种族差异反映了现今的环境的种种压力、遗传倾向、在小群居民中由于偶然事故造成的损失引起的变异性方面的非淘汰转变、在从地理上看来很显著的亚种（*subspecies*）或类型（*types*）之间过去的和现在的杂交、以及目前人类各种族对环境的选择适应，不管这种环境是极其寒冷还是温暖的，农村的还是城市的。每个这样的环境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以遗传为基础的）体质类型都会有它自己的选择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遗传学

在现代进化理论中最后发展起来的领域就是遗传学。它在体质人类学中是最后达到成熟的。关于人类遗传学我们相对地知道得很少，主要是因为人类是一种繁殖慢的动物，而且这种繁殖不能为了特定的特征而有意地控制以产生纯粹的

血统。人类遗传分析必须依靠可以观察到的资料，这种资料经常是来源于遗传因素与病理情况的结合。例如：在输血时发现不同的血型不能溶合在一起；后来又发现了血液中的Rh因子。

在二十世纪，在已经被分析过的人类遗传因素的数量方面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些因素与比较老式的人体测量学的技术一起，被用来确定居民中种族混杂的程度——例如在巴西的居民中研究黑色人种、高加索人种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相对比例。居民遗传学正成为体质人类学者手中的日益重要的分析工具。对生物进化的改变的现在观点是：它以突变开始，这种突变保存下来，并通过孟德尔式遗传的标本，在一些群体的遗传标本内保存并稳定下来。突变保存下来还是消失是根据自然选择的原则的。因为自然选择的原则同样适用体内遗传过程和居民遗传过程。

体质人类学的应用

对体质人类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对人体精确的描述，和对这个事实的认识：既使在一个群体中，人的变异也是很大的。这种报导实际上已被应用于军事装备的设计上；如防毒面具；并用于改进鞋子、衣着和家俱上。这些项目的外形有史以来就是根据习惯来决定，而不是根据人的体型和机体的需要的科学知识来决定的。运用人类变异范围内的知识对许多工业产品的设计贡献很大：从太阳镜和火车上的座位到飞机客舱和星际探索的设备。

在人身上发现的许多遗传复合体都和疾病有联系。因此在医药和体质人类学之间仍然有着一座桥梁。对生长的研究也是很有用的。例如在诊察病情时就联系到违反发育标准的异常现象。骨化和面部发育阶段的知识对于牙科矫形医生（

专门矫正牙齿不整齐的牙科专家)也很重要。体质人类学者积累起来的关于人的种族、性别、年龄、和病理等方面的差异的统计数字可以用来辨认意外事故发生后或战争期间人的遗体。在涉及到要验明身体的刑事案件中，人类学者的证明可能是决定性的。

人类学的历史

当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写关于希腊边境各民族的报导时，他是兼有文化人类学者的眼光和历史学者的眼光的。然而他的民族学方面的兴趣却是例外地着重在古代的世界上。罗马历史学家达西达斯(Tacitus)描述过日耳曼人，而凯撒(Caesar)描述过高卢人，但是人类学的研究并没有继续下去。对人类学各学科的持续兴趣开始于文艺复兴时代早期的资本主义扩张。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集中的探险和贸易使欧洲人注意到其他陆地的民族，并激励了他们对新发现的社会的起源和亲属关系的种种思考推测，使这种思考推测符合于西方欧洲人的世界观的这种意图就产生了最初的民族学理论。

在十八世纪，由世界旅游者带回来的私人收集的手工制品被它们自豪的物主们陈列在古玩柜橱里。由于他们的私人住房容纳不了这些搜集品，他们便经常把这些东西捐赠给政府。这就是今天极大的国家自然历史和人类学博物馆的基础。在以汉斯·斯洛恩爵士(Sir Hans Sloane)的收藏品为基础而创立的大英博物馆就是一个例子，它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物体——动物、蔬菜、和矿石——还有书籍和手稿。在整个现代人类学的历史上，培养人类学者的主要培训院校已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结合起来了，成为人类学的特征的野外研究

工作基本上来源于博物学家的工作。人类学家应用来研究人种和文化的那种技术本来就是为研究动物界和植物界而设计的。

文化人类学的起源

在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对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创立提供了研究重点。如果说生物的生命是由简单的生命发展为复杂的生命，那末就有可能把这个发展的假设同样应用于人类的文化上。早期的文化人类学者很多都是研究人类的业余爱好者，其中有很多人对于法律这样的职业很积极。他们开始着手于调查人类的某些特殊制度如宗教、艺术、或婚姻等的历史。这些人都是不走出去研究土人的“坐在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他们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演变很关心，而对一些特定的文化则不然。他们浏览了旅游者和传教士们的报导，为找出证据来支持文化演变的一般理论。

爱德华·泰勒爵士认为非西方文化是残存物(sw wies)，与世隔离的民族被认为保存有较早期的模式，正如动物学者把澳洲大陆看成是古老动物群的保护区一样。在西方文化中的古老残存物成为复原人类文化史的基础。早期的人类学者试图阐明全部人类文化的成长与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并且相信文化的成长已经没有什么变化地进行了一些阶段。这些信念在路易斯·H·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一书中细致地详述过。这本著作总结了他关于人类文化和各种制度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向前的，和向上的推进的见解，因为文化和各种制度与工业技术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二十世纪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和考古学者——的野外经验摧毁了十九世纪文化人类学关于进化论的宏伟计划。然而这门现代学科的许多概念与工作词汇都应归功于这些十九世纪

的理论。

现代人类学

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期间，各个学科的重点都从那种建立宏大的体系和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转移到经验主义上——凭籍观察和实验来寻求知识。科学研究的各种领域的新方向都是面向精确的实验室研究和深入细致的野外工作。这种研究工作会产生资料而不是理论。在人类学方面的这种转变特别明显，因为美国的主要教授弗兰兹·波亚斯（Franz Boas）在学过物理学之后就教人类学。波亚斯同他的学生们强调野外工作的深度，并以了解土著语言为重点。他们最初的目标是在美欧印第安人中，必须在证据消失之前获得民族志方面的财富。这些调查研究者对一些有限的复原历史的文物和一些文化变迁过程曾感到兴趣：例如他们研究过民间故事之类的文化要素对邻近群体的传播；以及与民间传说相合的现存模式。

功能主义

在美国人类学方面除了波亚斯的传统外，当时还有由雷金纳德·拉德克利夫—布朗（Reginald Radcliff-Brown）和布朗里斯诺·马林诺夫斯基所支持和发展的功能主义。这些人摈弃了搜寻有限的历史复原物。他们另行主张人类学野外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在于了解那种在起作用的不断发展的文化，他在那里是作为现场观察者。他们认为这种探讨撕掉了人类学者文物研究方向的最后一点碎片。野外工作者不会再鼓动老年人去描述过去的生活方式。相反，功能观点的民族志研究者必须观察、记录、参与这种文化和与文化相互依存的种种制度。锋芒对准这种功能的探讨的一种评论是：由于把它的重点放在结构上，它势必忽略文化的变迁。

文化变迁

关心文化变迁和性格变化，以及文化和性格的相互联系，对于许多现代的研究和理论都是很重要的。用分析文化革新诸如新的祭礼和宗教运动来间接研究文化演变的过程，以及对文化重点、崩溃、和复兴的调查都体现了功能主义以外的发展情况。由于功能主义的分析代表一些在特定时刻所作的调查，现在则有这样一种倾向：重新研究这些同样的群体，以便查明从原来的民族志的描述到目前这次描述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们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种对生长和发展的过程感到的兴趣，可能像是对流行于十九世纪的那些生长模型的回复。但是现代的民族志研究者正在发生了变化的同一个场所研究一个特定的文化，收集投射材料和涉及文化革新的个别人物的本人历史。当然，显而易见，为了理解那种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变化情况，而对“事情过去就是这个样子”划一定基线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建立在老年人的回忆上的史料和建立在详尽地复原过去的史料都成为紧要的。人类学者仍然对了解人类和文化的全部范围感到兴趣，但是他的观察和记录技术已从远处研究人类转移到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内包括对生活中熟悉的细节的各种研究。

作为一种专职的人类学

一个人类学者如果没有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就很难找到工作。对哲学博士的培训，学习的主要付科有：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志；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语言学。投考者应该在他的学习计划中尽可能多选一些有关领域的课程：如生物学、心理学和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一般要求在一个非西

方社会里的野外工作作为毕业生课程的一部分。美国人类学协会每年出版《人类学系课程指南》(The Guide to Departmental Offerings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这本书的目录里有：全体教师，特别课程或研究范围，以及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将近九十个具有专门培训设备的，为研究生提供研究的院校。

教学工作 and 博物馆工作

许多人类学者把大部分多产的岁月花在教学上，在以下三种水平上教授一种：(1) 培训研究生水平的未来的人类学者；(2) 把人类学作为文科教育的一部分教授给大学生；(3) 在初级中学校中介绍人类学。人类学被介绍到高级中学校去，有几种方法。首先，人类学者把这门科学教授给未来的教师，帮助他们把这个学派作为一种文化体系来理解，并帮助他们懂得一些文化的来龙去脉的意义，他们的学生即由此而来。人类学者也把语言学教给那些将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学生。而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再者，人类学的课程已列入初级中学的课程表。对历史和人类文化结构的学习可以帮助年青人开扩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并促进他们的智力发展。从事教学的人类学者经常把他们的夏天和休假年用在野外工作上。

人类学和博物馆之间的历史联系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许多人类学者都喜爱博物馆的工作。野外工作和研究二者都涉及到作一个博物馆收藏品的管理者，而有些博物馆的经理也从事教学。

其他职业

除了在大学或高级中学教书和博物馆工作这两个主要的工作以外，还有别的职业的可能性，这些职业包括有：给和

平队培训受训人员。在托管领土的行政管理上向政府提出意见，或者甚至于训练土著人民记录他们自己的文化体系，在已发展的各种社会中开辟的新领域，包括医院、精神病机构、学校、或者工厂里当职员。在这些单位里人类学者日益增多地被用来分析医生与病人、教师与学生、以及其他领域的密切的面对面的联系。威廉·斯图底凡特（William Sturtevant）已经出版了一本为人类学者编写的职业介绍书。

许多职业人类学者相信他们的学科能帮助学生打破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局限，用较远大的眼光观看全世界。对于一般的学生，人类学在文科教育中起开阔眼界的作用，而这种文科教育以前几乎全部都是由古典的学科所把持的。人类学让学生体验自己的文化以外的文化体系，而且使学生能够把另外的文化看作是由各个文化部分组成一体的象征性体系。了解到另一种文化中的结合与相互依存，可以有助于把他自己的复杂文化体系进行重新组合。

杰拉尔德·M·亨德森
(Gerald M·Henderson)

纽约市立大学
布鲁克林学院

在这本美国百科全书中其他地方的有关文章可以归纳在两个主要标题下（也可以参看人类学索引条目）

文化人类学、参看《考古学》；《民族志》；《民族学》；也可参看关于文化各方面的文章，如《农业史》；《动物的驯养》；《神圣的动物》；《泛灵论》；《斧》；《货物交换》；《篮子》；《民俗学》；和《神话学》，民族及其文化则列入有关国家和各大洲的文章里；例如，《非洲——1、非洲民族》，也可参看《印第安人》，《美洲人》。

体质人类学，参看《人类测量学》；《人类的史前类型》；《种族的性质与起源》；《进化》；以及论述特别题目的文章，如《土著居民与矮黑人》。

书 目

《人类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1965年纽约第三版, Beals, Ralph, 和 Hoijer, Harry 著）。

《其它文化》（Other Cultures, 1964年纽约出版, Beattie, John 著）。

《考古学简论》（A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1962年纽约出版, Childe, V. Gordon 著）。

《人类史话》（The Story of Man, 1962年纽约第二版, Coon, Carleton S. 著）。

《普通人类学读本》（A Reader in General Anthropology, 1948年纽约出版, Coon, Carlton 著）。

《考古学一百年》（A Hundred Years of Archaeology, 1950年伦敦出版, Daniel, Glyn 著）。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1955年纽约出版, Herskovits, Melville J. 著）。

《人类真相》（Mirror for Man, 1949年纽约出版, Kluckhohn, Clyde 著）。

《人类学》（Anthropology, 1948年纽约修订版, Kroeber, Alfred L. 著）。

《今日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 1953年芝加哥出版, Kroeber, Alfred L. 著）。

《文化史》（The Tree of Culture, 1955年纽约出

版, Linton, Ralph著)。

《民族学学说史》(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 1937年纽约出版, Lowie, Robert H.著)。

《体质人类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Anthropology, 1960年伊里诺第三版, Montagu, M.F. Ashley著)。

《民族学剖析》(Profiles in Ethnology, 1963年纽约出版, Service, Elman著)。

《人类学前景》(Horizons of Anthropology, 1964年芝加哥出版, Tax, S OJ编)。

供专业研究用的参考书

《人类学系课程指南》(Guide to Departmental Offerings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华盛顿年刊, 美国人学学协会出版)。

《语言》(Language, 1961年纽约出版, Bloomfield, Leonard著)。

《原始艺术》(Primitive Art, 1962年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新版, Boas, Franz著)。

《民俗学研究》(The Study of Folklore, 1965年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出版, Dundes, Alan著)。

《达尔文的世纪》(Darwin's Century, 1958年纽约出版, Eiseley, Joren C.著)。

《社会人类学论文集》(Essay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纽约1963年出版, Evans—Pritchard, Edward著)。

《人类类型》(Human Types, 纽约1938年出版, Firth, Raymond著)。

《人类种族》 (Human Races, 伊里诺州斯普林菲尔德1965年第二版)

《文化与经验》 (Culture and Experience, 费城1957年出版, Hallowell, A. Irving著)。

《人类》 (The Human Species, 纽约1963出版, Hulse, Frederick S. 著)。

《结构人类学》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1963年纽约出版, Lévi-Strauss, Claude著)。

《音乐人类学》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1964年芝加哥出版, Merriam, Alanp. 著)。

《语言: 言语研究入门》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1921年纽约出版, Sapir, Edward著)。

《作为一种专业的人类学》 (Anthropology as a Career, 1958年华盛顿出版, Sturtevant, William C. 著)。

《文化与性格》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1961年纽约出版, Wallace, Anthony F. C. 著)。

《宗教—人类学观点》 (Religion,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1966年纽约出版, Wallace, Anthony F. C. 著)

《语言, 思想和现实》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1956年剑桥版, Whoy, Benyaniml. 著)

期 刊

《美国人类学家》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华盛顿, 双月刊, 美国人类协会编)。